

中国教育早期 现代化问题研究

——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

ZHONGGUO
JIAOYU ZAOQI
XIANDAIHUA WENTI YANJIU

田正平 陈胜 著



中国教育早期 现代化问题研究

——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最终成果

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成果之一

ZHONGGUO
JIAOYU ZAOQI
XIANDAIHUA WENTI YANJIU

田正平
陈胜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 / 田正平, 陈胜著.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38-8358-4

I. 中… II. ①田…②陈… III. ①教育事业—现代化—研究—中国—清后期②教育事业—现代化—研究—中国—民国 IV. G5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8563号

责任编辑	周俊	林宏程	责任校对	戴正泉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印务	温劲风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 ——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

田正平 陈 胜 著

- 出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
- 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图文制作: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710×1000 1/16
- 印张: 20
- 字数: 288 000
-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 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
- 本次印数: 0 001-1 000
-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8-8358-4
- 定价: 38.00 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jy@zjcb.com

网 址: www.zjeph.com

目 录

导 论

一、写作缘起	1
二、学术史回顾	7
(一) 科举制度的停废及其影响	7
(二)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研究	9
(三) 乡村教育冲突研究	12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17
(一) 清末民初	17
(二) 乡村	18
(三) 乡村教育	19
(四) 教育冲突	19
四、研究方法及内容概要	20

第一章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发展鸟瞰

一、乡村新教育的发轫:1901—1905 年	24
二、乡村新教育的全面展开与教育矛盾的凸显: 1905—1911 年	33
(一) 清政府的兴学举措	34
(二) 乡村新式教育的发展	45
(三) 乡村新式教育存在的问题	50
三、乡村新教育的曲折发展:1912—1922 年	53
四、一个案例:沈家行村的教育变迁	63
小结	66

第二章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及其表征(上)

- 一、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矛盾与冲突概观 71
 - (一) 乡村教育矛盾 71
 - (二) 乡村教育冲突 73
- 二、消极行动:抵制与负面舆论 77
 - (一) 乡村民众对新式教育的抵制活动 77
 - (二) 负面舆论:以谣言为例 89

第三章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及其表征(下)

- 三、对簿公堂:乡村教育诉讼 95
 - (一) 乡村教育诉讼 95
 - (二) 乡村教育诉讼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96
 - (三) 乡村教育诉讼的内容 100
 - (四) 乡村教育诉讼的主体 102
- 四、暴力行动:乡村毁学风潮 104
 - (一) 乡村毁学风潮 104
 - (二) 毁学事件的两种形式 107
 - (三) 毁学事件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110
 - (四) 毁学事件的内容 113
 - (五) 毁学事件的主体及动机 115
 - (六) 地方官员与毁学事件 118
- 小结 119

第四章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原因探析(上)

- 一、乡村新旧教育的递嬗与教育冲突 122
 - (一) 乡村新旧教育的冲突 122
 - (二) 乡村民众对新旧教育的态度取舍 132

二、乡村经济利益的重构与乡村教育冲突	138
(一) 新教育与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	139
(二) 乡村教育负担与乡村教育冲突	148

第五章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原因探析(下)

三、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教育冲突	161
(一) 乡村绅士与乡村教育冲突	162
(二) 普通民众与乡村教育冲突	170
(三) 教民与乡村教育冲突	174
(四) 僧侣与乡村教育冲突	176
四、乡村文化生活的阻断与教育冲突	178
(一) 清末民初的乡村庙会	179
(二) 庙会与乡村新教育	181
(三) 庙会等活动的取消与教育冲突	189
五、权力场域中的教育冲突	191
(一) 绅权的扩张与官绅冲突	191
(二) 乡村内部权力的攘夺与教育冲突	196
六、作为乡村社会矛盾替罪羊的新教育	199
小结	204

第六章 乡村教育冲突的影响及解决途径

一、乡村教育冲突的影响	205
(一) 教育冲突与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的挫折	205
(二) 教育冲突与近代乡村社会危机	212
二、乡村教育冲突的主要解决途径	218
(一) 舆论疏导:劝导与宣讲	219
(二) 居间调停:调解与仲裁	228

(三) 公事公办:裁决与惩罚	233
三、乡村教育的调适	238
(一) 政府主导的政策性调适	239
(二) 乡村教育的自我调适	243
小结	253
余论 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课题	255
附录一 清末浙江教育诉讼案件一览表	267
附录二 清末《申报》中报道的乡村教育诉讼案件汇总表	279
附录三 清末各地毁学事件简表	291
重要参考文献举要	299



一、写作缘起

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教育是一项以人的培养为核心的事业,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从而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从世界范围内考察,那些走在现代化前列的国家,固然有许多因素在发挥着作用,但毫无例外的一点是,这些国家或民族的教育也走在那个时代的前列。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有很长一段时期曾经站在世界的前列,对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教育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批宝贵的人才资源。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狂潮之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这当然主要是由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的。但是,封建教育的僵化、空疏导致的对人才的压抑和摧残,同样是中国近代受尽欺凌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当19世纪60年代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之时,传统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追求就成为政府和民间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近百年的历程中,20世纪之前更多地体现出“后发外生型”的典型特征,一批外语、军事、技术学堂的创办,数百名青年学子的留学海外,主要是受紧迫的外交和国防建设需要推动的。近30所新式学堂毫无例外地设立在沿江或沿海的上海、广州、福州、天津等口岸城市。至19世纪末,也就是在教育现代化启动将近40年后,在中国版图上最广大的农村地区,在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乡村民众仍不知现代教育为何物。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教育才借政府之力向广大乡村推进。与新式教育在城市中迅速站稳脚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努力遇到了顽固的抵制,步履维艰,发展缓慢。在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始终走着城市和乡村分途行

进的二元路线。

20 世纪初,当清政府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推向广大农村时,中国乡村社会正发生着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造成小农经济的解体。美国学者黄宗智认为,这一变化虽然没有把中国小农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经济,但仍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乡村社会迅速走向衰败化、边缘化和半无产化,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差距加大、乡村社会的整合能力大为减弱等几个方面。^① 二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发生巨大改变,乡村社会矛盾加剧。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这一过程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国家通过推行各种现代化措施,如建立现代警察制度、兴办新式教育、实行财政改革、划分新的行政区域和建立各级自治机构等,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更多地吸收基层社会的财源。^② “新政”的每一项措施无不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而绝大多数财政负担又都转嫁到日益贫困的乡村社会头上,乡村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各种冲突此起彼伏。

这两方面的变化对 20 世纪初启动的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新式教育开始出现在乡村时,它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穷困而又矛盾重重的环境之中。作为一种“舶来品”和“外来者”,新式教育不仅要面对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乡村私塾的挑战,甚至也不为普通乡民所认同,抵制、诋毁、暴力破坏新式教育的冲突事件在各地乡村频频发生。日本学者阿部洋通过《东方杂志》、《教育杂志》、《顺天时报》、《盛京时报》上的报道和一些方志资料,整理出清末各地乡村发生毁学事件 151 起。^③ 我们在翻阅清末民初各省教育官报和其他报刊时发现,除毁学事件的信息之外,更有大量有关教育问题诉讼案件的批文与报道,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教育纠纷在演变为“毁学”的暴力行为之前是通过诉讼这样一种非常规的方式

① [美]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②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页。

③ [日]阿部洋著:《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 1993 年版,第 163 页。

解决的。以浙江为例,在1908年7月至1911年7月三年间,经浙江提学使司批饬的乡村教育诉讼案件就达256件之多。^① 这些数字表明,在清末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冲突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甚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冲突在广大乡村地区依然十分常见。1924年,舒新城在湖南、安徽等地乡村看到,农民们宁愿花费大量的钱财用于迎神赛会等活动而不愿捐款给学校,教会学校可以轻而易举地筹集到大量教育经费,却很少有人愿意捐款给当地乡村的新式学校。由此他得出结论:乡村教育经费匮乏不尽是经济问题,也不在于政府引导不力、管理不善,而在于它“不能引起一般人的信仰”,在于乡间民众对新式教育缺乏认同。^②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考察时也指出:“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③ 大约十年之后,1936年廖泰初通过对山东汶上县私塾与新式学堂的情况进行调查后指出:“老百姓们的无意无准备接受西洋文化,正如他们无意无准备接受‘洋学’一样,他们的家族组织经济机构还不容许他们那么办。频年的革命只是及于几个城市,内地仍然在换汤不换药的境况中。”“洋学是在政府的严令下挣扎维持着,私塾则在百姓们的拱托里枝叶繁生,没有政府,洋学早是‘寿终正寝’叫私塾压死了。”^④ 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教育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一大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而且身体力行脱下西装、皮鞋,穿上中装、布鞋,到乡村去,到乡村民众中去开展教育改革。这一运动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世纪之初教育冲突等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各种问题的一种历史回应。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中存在的许多矛盾与问题的根源,又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现代化刚刚启

① 《浙江教育官报》,1908—1911年第1—96期。

② 《小学教育问题杂谈》,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页。

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④ 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北京:燕京大学1936年版,第2、3页。

动之时。

那么,清末民初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对乡村教育现代化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应当如何解决?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对清末民初乡村教育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可以说,不了解中国乡村教育,就难以了解中国的教育;不了解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就难以真正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以1901—1922年中国乡村教育为对象,以乡村教育冲突为切入点,考察近代乡村教育变革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以期揭示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力图真实地反映转型时期乡村教育的实际状况,提供一个认识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和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窗口,为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对于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教育变革和现代教育产生、发展进程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致力颇勤。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先后出版了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陈启天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等教育史著作。1949年至1981年的三十多年间,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成为这个领域唯一的研究成果。上述五种有代表性的著作,就其写作目的而言,都是作为高等学校教育学系的教材而撰写的。比如说,分别由陈青之、陈东原所撰写的《中国教育史》,都是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部定大学教材;陈景磐所著《中国近代教育史》亦是六七十年代的高等学校指定教材。因此,上述著作受教材编写体例本身的诸多限制,当然也受研究视角的限制,关注的基本上是沿江、沿海口岸城市和相对发达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乡村教育关注较少,如果提及,也大多是一带而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毛礼锐等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王炳照等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李国钧等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和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有影响的重要成

果。前三种均是通史性研究著作,集全国学术界之力,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后一种是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上都有一定的新意,但所涉及的问题,总的来看,仍然主要是宏观性专题,如留学教育、学制问题、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等。2002年出版的由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分析框架、史料发掘到整个体系的建构以及研究视角的选择,都体现了国内学者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水平。但囿于长期形成的研究范式,当然也包括观念的影响,所关注的专题,从总体上看仍没有跳出传统的研究框架,如教育理论的建构、教育制度的演进、教育家群体分析和个案解剖等;从地域上看,仍然集中在沿江、沿海口岸城市和地区;广大农村和乡村民众的教育实况,很少得到反映,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在广大农村是如何推进的,其路径和图景都模糊不清。

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日本学者起步较早,成果也比较丰富,如平塚益德的《近代中国教育文化史》、阿部洋的《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佐藤尚子的《美中教育交流史研究序说》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特点是在资料搜集和考证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尤其是在中日教育发生关系的领域,其研究非常精细,而其他领域则较少涉及或语焉不详。欧美学者的相关成果不是很多,已有的成果主要是就某个领域进行的专题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的《20世纪初年中国教育改革概况》、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的《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美国学者毕乃德(Biggerstaff Knight)的《洋务学堂》等。巴斯蒂的《20世纪初年中国教育改革概况》涉及我们关注的主题,将在下面作进一步评述。另外的两种,许美德的《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是有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专题研究,毕乃德的《洋务学堂》则是关于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改革的专题研究。

基于上述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逐步改变着以教科书编写和通史性著作编写为目的的研究格局,涌现出一批专题性研究成

果,而且,其中的部分成果在理论分析、资料搜集、研究视野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相对于近百年来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而言,上述成果还显得不够丰满,比较宏观,或者说,比较粗犷,不够精细。多年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制度变迁、理论传入、各种教育思潮以及教育家的思想和活动等几个大的板块。这些内容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上,上述研究更多体现的是“统治”层面和“精英”层面的活动,反映的是沿江、沿海口岸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教育变革,而“平民”层面、“基础”层面的变革与实践却很少得到反映,中国广大农村和乡村民众教育的实况更是难觅踪影。众所周知,教育的现代化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一样,如果没有基础层面的变革和广大民众的参与,就很难真正实现。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村地域辽阔、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度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就谈不上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不了解中国农村教育变革的实态,就很难全面理解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我们认为,这一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 关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实态,转变研究视角,拓展教育史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限于著述体例、研究范式和资料的可获得性以及乡村社会的复杂性等因素,乡村教育,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乡村教育长期游离于教育史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很少有人关注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本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教育冲突为切入点,考察近代以来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研究视角的下移,可以拓展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

2. 有助于加深和丰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教育现代化,反映大工业生产需要的西方现代教育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逐渐“楔入”中国社会,成长为中国的主导教育模式。作为一种“舶来品”和一种异质文化的代表,它必然会受到本土各种力量的抵制,产生种种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近代教育与近代社会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中国社会的底色是“乡土性”的^①,乡村占据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拥有绝大多数人口,是传统力量最顽强、最深厚的地方,因而也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暴露得最为充分的地方。“在渐趋‘西化’的近代化城市见不到的问题,不显著的问题,在农村社会里还是光彩夺目的。”^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和丰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认识与了解。

3. 有助于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创新

相对而言,近代以来,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人类学界、社会学界做了较多的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本研究将借鉴和引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框架和分析工具,把这些学科中一些较为成熟的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当中,这有可能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从而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二、学术史回顾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问题,在一些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史著述中均有所涉及,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大致而言,乡村教育冲突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科举制度的停废及其影响

研究者普遍认为科举制的停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它为新式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对清末民初的教育,包括乡村教育的发展影响巨大。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认为,科举制的停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但也给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带来一系列后果。它使乡村中一部分人得以向外寻求发展,从而使乡村社会

①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② 廖泰初著:《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北京:燕京大学1936年版,第2页。

的资源掌握在一批“只有个人和局部利益之徒”的手中,城乡教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界限更为分明。科举制度的停废还大大改变了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造成了明显的文化中断,引发了人们就何种教育形式更适合新时代需要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① 日本学者市古宙三认为,科举制度的停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教育状况,反而产生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缺乏合格的新式教师、新式教育为旧式文人所控制、旧教育的很多东西在新制度中保留下来,使“‘学堂’与科举考试仅仅是一词之异而已”。^② 在乡村社会中,这些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李世瑜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集中探讨了科举制度的停废对乡村教育的影响,指出它导致乡村旧教育体系解体,而新式教育又多集中在县城以上的城市中,乡村教育发生断层;再加上乡村教育观念滞后,教育经费及师资力量匮乏,乡村中失学现象大量增加,乡村教育发展严重受阻,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拉大。^③ 萧公权、王先明、罗志田等人则十分关注停废科举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指出它使大批乡村精英纷纷离乡,进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便利,但同时也导致乡村精英的再生产链断裂,乡村绅士中读书人的比例逐渐降低,道义的束缚力日减,由此出现所谓的乡绅“土豪劣绅”化倾向。这样,乡村社会日益为一批教育程度较低的土豪劣绅所控制,使刚刚在乡村社会中萌生的新式教育掌握在一群无知之徒手中,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乡村教育与乡村民众的关系不断恶化。另外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指出,科举制度的停废导致清末

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635页。

②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429页。

③ 李世瑜:《清末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光明日报》2007年11月9日。

民初乡村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冲突不断,教育冲突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①

(二)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研究

国内学者关注清末民初的乡村教育,焦点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经济萧条、文化荒芜、人才匮乏、危机重重,乡村教育也处于破产的边缘。余家菊、梁漱溟等人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末新式教育的推行,一方面把大批乡村人才吸引到城市中去,另一方面受过新式教育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又都不愿回到乡村教书,结果是乡村新式教育普遍被旧式绅士所把持,新式学堂的名声极为败坏,乡村社会对新式学校十分反感,“凡是家事小康的人家,都不愿意让子弟在乡村读书”^②。不过,杜赞奇、黄宗智等人的研究则指出这种现象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

舒新城、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人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危机原因进行了探讨。舒新城、晏阳初等对清末以来教育改革中忽视乡村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集中于乡村,乡村社会仍然是一个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而教育改革者不顾中国乡村的这一具体情况,强行把与近代工商业文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国乡村,而这种教育制度无论是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在具体的教学安排、教学组织形式上都与乡村社会生活格格不入。新式教育得不到乡村民众的认同与接受,乡村民众对新式教育的抵触情绪十分严重,

①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王先明:《近代史研究的乡村史研究回顾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先明:《晚清绅士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王先明:《近代绅士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常书红、王先明:《清末农会的兴起与绅士权力功能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罗志田:《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罗志田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引论”部分。

② 余家菊:《乡村教育的危机》,《中华教育界》1920年第10卷第1期。梁漱溟:《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梁漱溟教育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对新式教育的抵触活动十分频繁,新式教育自然得不到很好的发展。黄炎培则对近代以来乡村教育中的城市化取向提出异议,他说:“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乎?抑属于乡村为多矣?吾敢断言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久居乡村者姑勿论,即论城市往来负贩之夫、佣役食力之辈,试一览通衢,此蹢躅其间者,吾敢断言其皆来自田间也。”但是,自清末推行新教育以来,乡村新式学校“十之八九所施皆城市教育也”。^① 陶行知进一步指出,这种城市化教育的严重后果就是培养出来的人会变得无法适应乡村社会:“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② 乡村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严重脱节的这种情况,使得乡村民众普遍对新式教育缺乏信仰,新式教育得不到乡村社会的支持,而乡村人才的大量流失,又加重了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危机。这一时期出版的几本教育史著作,如陈启天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等也对清末民初乡村教育不顾中国乡村社会特点,盲目抄袭西方及日本的教育制度,在乡村教育中推行城市化教育的做法多持批评态度。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对20世纪前半叶乡村教育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直到80年代以后,乡村教育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田正平等在肯定清末教育改革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指出由于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清末乡村教育不仅数量上得不到平衡发展,教育质量也出现了很大问题;乡村教育的状况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清末各地各种教育冲突频发,特别是毁学风潮此起彼伏。^③ 商丽浩则从教育财政学的角度,通过对

① 《农村教育弁言》(1921年),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②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③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